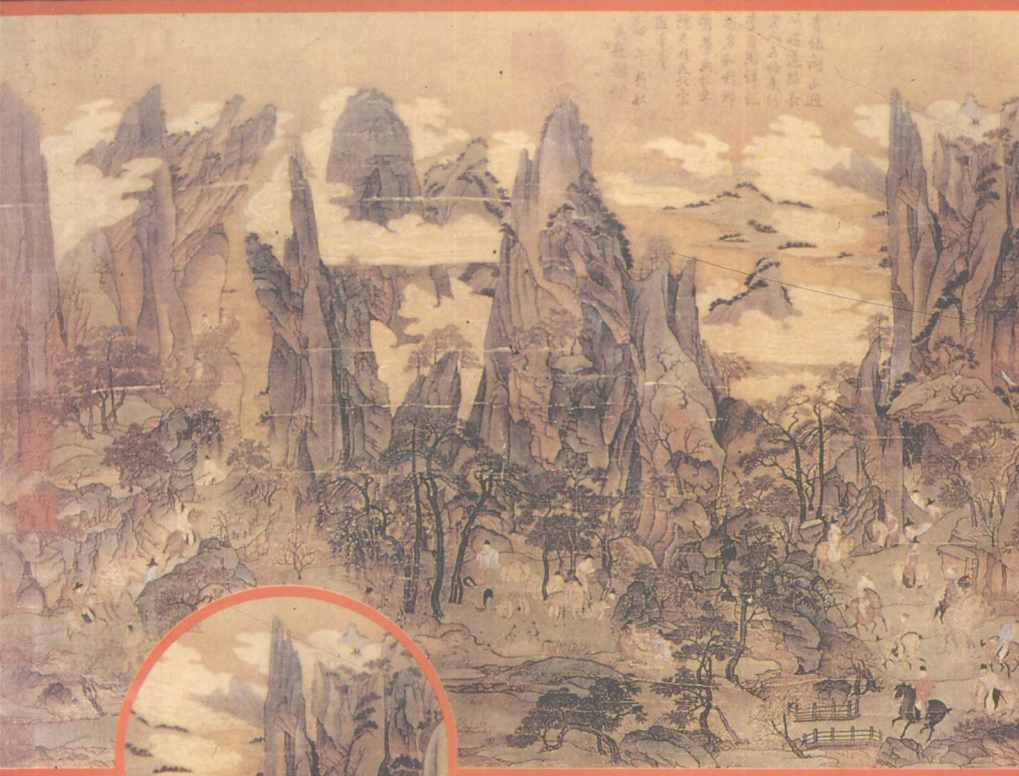




-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 西北大学中文系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主编

唐代文学研究

（第五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唐代文学研究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1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新登字 04 号

《唐代文学研究》编委会

主编 傅璇琮 周祖谟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吴在庆 张明非 肖星明 周祖谟

赵昌平 党玉敏 贾晋华 阎琦

傅璇琮

唐代文学研究

(第五辑)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 主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肖星明 责任校对:林 圆 封面设计:杨 琳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地质测绘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125 插页:2 字数:73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7—5633—1926—3/I·097

定价: (平)28.50 元
(精)33.50 元

目 录

干谒与唐代诗人的心态	薛天纬(1)
论唐代乐舞诗的价值	张明非(17)
女儿节的情思	董乃斌(29)
论唐宋诗的整合	林继中(42)
唐太宗诗歌考辨	胡可先(60)
宋之问事迹和交游五题考辨	郁贤皓(72)
孟浩然诗歌艺术营蒯论	刘文刚(82)
盛唐北地士风与崔颢李颀王昌龄三家诗	赵昌平(97)
另一种形式的浪漫主义	荆立民(126)
“桃源勿遽返,再访恐君迷”	[新加坡] 王润华(139)
李白的侠客形象	[新加坡] 王国瓊(152)
试论李白的孤独意识	詹福瑞(175)
李白待诏翰林失败原因刍议	李子龙(188)
李白传奇与史实	裴 斐(208)
李白《蜀道难》寓意探讨	[台湾] 罗联添(225)
高岑七古排句之特点	[台湾] 阮廷瑜(255)
论杜甫的文化心态结构	杨恩成 杜晓勤(266)
论杜诗直起法	陈祥耀(275)
由新发现的韦济墓志看杜甫天宝中的行止	陈铁民(291)
郑虔丹邱寺佚诗考	王晚霞(297)

刘长卿在唐代七律发展的地位·····	[香港]	邓仕梁(312)
“韦苏州之疏淡”及其他·····		储仲君(328)
论梁肃的佛学造诣及其对唐代古文运动的贡献·····		姜光斗(333)
陆贽政论艺术管窥·····		王春庭(343)
“放情咏《离骚》”·····		戴伟华(357)
柳文指瑕例证略析·····	[香港]	王晋光(370)
柳宗元和吕温·····		杨慧文(382)
论韩孟集团·····		贾晋华(402)
权德舆与贞元后期诗风·····		蒋寅(415)
论元稹“莺莺诗”的创作心态·····		黄世中(439)
白居易诗集四分类试论·····	[日]	静永健(454)
关于《琵琶行》的创作·····	[日]	入谷仙介(468)
白居易诗中的“北窗”及“竹窗”的问题 ·····	[日]	西村富美子(480)
分歧与融通·····		刘学锴(489)
李商隐考略二题·····		梁超然(500)
✓司空图诗重出甄辨·····		佟培基(507)
✓罗隐生平及若干诗文人名作年考索·····		吴在庆(514)
晚唐诗人周繇及其作品考辨·····		陶敏(527)
新罗诗人崔致远·····		阎琦(537)
✓唐代闽籍诗人考·····		陈尚君(559)
✓五代楚国诗人沈彬考辨·····		周寅宾(571)
论杜甫的文学史观·····		莫砺锋(578)
吴体与齐梁体·····	[香港]	邝健行(589)
略论唐代古文运动的第二阶段·····	[日]	户崎哲彦(603)
韩愈的文气说·····		张清华(619)
音乐与讽刺·····	[香港]	黄耀堃(630)

关于江湖诗派学晚唐的若干问题····· 张宏生(643)

《枕中记》的主角研究····· [韩] 丁范镇(662)

《隋唐嘉话》考····· 周勋初(672)

《才调集》考····· 傅璇琮 龚祖培(681)

《搜玉小集》考略(节要)····· [美] 李珍华 傅璇琮(700)

唐集书目要录例举····· 陈耀东(706)

整理韩文 各树一帜····· 卞孝萱(719)

李翱集版本源流考辨····· 金涛声(733)

从唐诗载录看《诗渊》的价值与弊病····· 吴企明(743)

唐诗选本与明代复古诗论····· [香港] 陈国球(753)

《唐代诏敕目录》疏漏讹误刍议····· 韩理洲(808)

国色天香昭代荣····· 杨 军 曾 明(819)

唐代长安城的沙堤····· [日] 丸山 茂(830)

论《辋川集》及蓝田辋川风景区的建设····· 师长泰(849)

日本研究柳宗元概述····· 黄锦镗(864)

韩国近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情况····· [韩] 金在乘(872)

德国的唐诗翻译和研究····· [德] 陈月桂(883)

切磋交流 扶掖后进····· [澳门] 胡培周(888)

后记····· (894)

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

薛天纬

一 荐举与干谒

有唐一代，实行科举取士。科举用考试法衡量和录用人才，所谓“金榜前头无是非，平人分得一枝归”（赵嘏《李先辈擢第东归有赠送》）。就其本义来说，是以客观、公正的平等竞争为基本特征，而应排除人为的主观干预。考试是好办法，好到经得起千余年来的历史检验，以至现代生活中仍普遍采用而尚不能以更好的办法来代替它。但是，唐代实行考试法并不彻底。终唐之世，朝廷取士实际上是科举与荐举并用。荐举的存在，有两种情况：一是与科举相伴随，渗透于科举之中；二是与科举相平行，独立于科举之外。

与科举相伴随的荐举，主要发生在礼部主持的国家级考试，即省试中。一些权豪贵要或文坛钜公往往于科考前对某举子加以揄扬甚或向主考官保荐，从而人为地促成其中举。甚至皇帝也有过向主考官荐人的事。^①向主考官的荐举，有时通过其辅佐者来转达，这些辅佐者称为通榜或通榜帖。《唐摭言》卷八有“通榜”一节，记载

^① 《封氏闻见记》卷三载，李林甫曾在玄宗面前为其女婿王如泚求一进士及第，玄宗竟“许之，付礼部宜与及第”。

了数则通榜所举之人考试俱捷的事实。省试之前，举子无论来自学馆或州府，均须通过预选性考试。有关文献记载，州府的考试也常常伴随有地方官的人为荐举。至于科举之外，尚有“天子自诏”以待非常之才的制举，制举的应试者都是经由州府推荐来京，这一环节就更是单纯的荐举了。

与科举相平行的荐举，是指在官员或权贵的荐送下，朝廷不经考试而直接录用人才。最著名的例子，是太宗时马周西游长安，经中郎将常何的荐举入仕为朝官，终于青云直上而致宰相。当时，“帝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三百匹”（《旧唐书·马周传》）。又如《新唐书·方技传》载，蓟州人师夜光“少为浮屠，至长安，因九仙公主得召见温泉。帝奇其辩，赐冠带，授四门博士，赐绯衣、银鱼、金绶千数，得侍左右如幸臣。”^①唐代有向朝廷上书、献赋或献诗而入仕一途，其间往往需要有权人物的举荐。如诗人李群玉应试不第，转而向宣宗皇帝进诗三百首，在宰相令狐绹的荐举下授官弘文馆校书郎。^②《唐大诏令集》“政事”类有“举荐”一书，载录历代皇帝命令地方官员（有时也包括京官）举荐各类人才的诏书。从文字看，这些诏书很难说都与制举考试有关，因为文中往往不见制科名目。这就有力地证明了荐举是独立于科举之外的朝廷取士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唯其制度化的程度不如科举那样规范罢了。

朝廷既开荐举之路，士子必行干谒之事。荐举给仕进制度带来了人为干预，求仕者就不能不去争取人为的援助。士子干谒大体也有两种情况：多数人是为了借助有力者的奥援而科考得中。唐代进士试盛行的“行卷”——考试前，应试举子将平日所作诗文经过精选，写成卷轴，呈献给当世显人，请他们向主考官推荐——就是最普遍的、具有定式的干谒行为。另有一些抱负极为不凡的士人（当

^① 事又见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独异志·宣室志》中《宣室志辑佚》。

^② 事见李群玉《进诗表》、令狐绹《荐处士李群玉状》、郑处约《李群玉守弘文馆校书郎敕》。

然应排除师夜光一类投机者),不耐烦循规蹈矩地应试以入仕,而欲平步青云,如马周那样“直犯龙颜请恩泽”。为了寻求媒介,以叩开帝王的九重之门,他们也必须干谒权要。

平心而论,朝廷开荐举一途,对于广开才路并非没有好处。士子们怀抱着用世热情进行干谒,也是情理中事。但干谒终究与考试不同。它使士子们不再单纯面对无言的试卷,而卷入了人与人的关系之网。干谒的实质是本身才具的自鬻,它当然不能不以一定的才具为资本。但有才者未必能被当权者赏识,未必干谒有成,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难于说清楚的人为因素,其中并无公道可言。正因为如此,从事干谒的士子们的遭遇境况和感情动荡,较之单纯的科场应试就要激烈得多、复杂得多。唐代众多诗人、包括许多著名诗人都曾有过干谒的经历。围绕干谒考察其感情活动,是我们了解唐代诗人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窥孔。

二 自矜与躁进

唐代士子对于仕进的热心是空前的,诗人更是得风气先,差不多都不安分仅仅作诗人(况且当时并无诗人这一社会职业),而企求仕途的显达。为了仕进,于是纷纷干谒。以“初唐四杰”而论,除了杨炯因十岁即举“神童”,可能无须干谒外,其余三人入仕前均有干谒之事。王勃十五岁时,作《上刘右相(祥道)书》。书中议论天下大事,纵横开阖,踔厉风发,并且直言“君侯未谕”之四端,口气之大,令人咋舌。书末求刘荐举,曰:“君侯足下,出纳王命,升降天衢,激扬风宸之前,趋步麟台之上,亦复知天下有遗俊乎?……伏愿辟东阁,升北堂,待之以上宾,期之以国士,使得披肝胆,布腹心,大论古今之利害,高谈帝王之纲纪。然后鹰扬豹变,出蓬户而拜青墀;附景抟风,舍蓑衣而见纶阙。幸甚,斯不为难矣!”完全一副命令口吻,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稍后,为了向朝廷献《宸游东岳颂》而干人,在《上李常伯启》中说:“当仁不让,下走无惭于自媒;闻善若惊,

明公岂难于知我？”口气依然大得惊人。卢照邻于病中作《释疾文》，回忆当年之事曰：“既而屠龙适就，刻鹄初成，下笔则烟云飞动，落纸则鸾回凤惊。通李膺而窃价，造张华而假成；郭林宗闻而心服，王夷甫见而神倾。俯仰谈笑，顾盼纵横。自谓明主以令仆相待，朝廷以黄散为轻。”^①“通李膺”、“造张华”云云，说的都是干谒，当时其心地也是高得可以。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诗人进行干谒时的一种普遍心态，即他们总是抱着很高的期望值，一方面对个人才分视之甚高，另一方面把仕进前景想象得过于美好。这种心态，可概括为自矜与躁进。

上述心态，在盛唐诗人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王之涣，据《唐才子传》载，少有侠气，“中折节工文，十年名誉自振。耻困场屋，遂交谒名公。”他不屑走科举道路而从事干谒，显见其抱负不凡，虽然后来只做到文安县尉。高适，《河岳英灵集》小转载：“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他也是鄙弃常科而倾心干谒。在《行路难二首》中，他对长安的风流少年和富贵人家极表羡慕，并深致感慨曰：“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青年时代入长安求仕不果，过后他在《别韦参军》一诗中回忆道：“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少年意气，不胜其感奋。“取公卿”如此便当，只有通过干谒一途。这次的结果虽然是“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未能叩开君门，但他“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豪气益盛而略无愧馁之色。此后三十年间，他继续以干谒为事，终于在五十岁之年干谒有成，经睢阳太守张九皋的推荐而举有道科中第。据其《奉寄平原颜太守（真卿）》诗序云，当时张九皋将他的诗集奏给唐玄宗，颜真卿“又作四言诗数百字并序，序张公吹嘘之美，兼述小人狂简之盛，遍呈当代群公”，在上层社会中大大扩展了他的影响。此处“狂简”二字，正是高

^① 轻，本作经，任国绪《卢照邻集编年笺注》以为当作轻，今从之。

适当心态的绝好写照。

诗人李白早年的干谒经历，尤其有代表性。李白的从政理想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实现理想的方式又是“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这就注定了他必得取干谒一途。约开元十八年李白三十岁时，拟由寓家之地安陆西游长安，其时作有《上安州裴长史书》。据书中语，平日屡屡造谒裴长史，颇受青睐，后谤言忽生，遭裴疏远。李白将行之际，上书于裴，希望他能“终乎前恩，再辱英盼”，达成谅解。不然，李白在书中写道：“若赫然作威，加以大怒，不许门下，逐之长途，白即膝行于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观国风，永辞君侯，黄鹄举矣。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如此上书干谒，无异于掷下一份“最后通牒”。更令人绝倒的，是有名的《上李邕》诗。李邕乃大名士，“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观”（《旧唐书·李邕传》）。但青年李白初次谒见他时，竟上诗云：“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先是自夸其大鹏之志，继而将世人嘲笑一番，结末竟以教训的口气反过来规劝李邕，要他摆正了对自己的态度。狂傲之态，蔑以加矣。

自矜发展为对干谒对象的不敬，会闹出笑话来。一个人们熟知的故事，仍与李邕有关：《新唐书·文艺传》记，诗人崔颢名为李邕所知，“虚舍邀之。颢至献诗，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接而去。”也许在崔颢看来，干谒大人物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漫不经心，所以做出了这种不顾体统的荒唐事。

更有甚者，是一个叫杨光远的人。《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进士（按，即举子）杨光远，惟多矫饰，不识忌讳。游谒王公之门，干索权豪之族，未尝自足，稍有不从，便多诽谤。常遭有势者挞辱，略不改悔。时人多鄙之，皆云杨光远惭颜厚如十重铁甲也。”干谒不得

意，便要骂人，挨了打也不在乎。这固然是个无行文人，但他在王公权豪面前的放纵行为却使人忍俊不禁，甚至感到几分快意。

上举诗人，除高适外，仕履皆不足称。就他们干谒时的抱负来说，固可曰躁进。自矜而又躁进这种心态，固然符合诗人的一般气质，就其根本来说，则是唐代社会里普通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所致。地位高了，用世热情随着高涨起来，便会对自身产生不切实际的估价，并对社会现实产生过高的期望。自矜与躁进是一种开放型、向上型心态，抛开读书人历来好幻想这一点不说，这种心态未尝不使我们体会到一种民主与精神解放的气息。

三 委屈与自饰

并不是所有诗人从事干谒时都具有上述那种感觉良好的心态，也不是上述诗人干谒时始终都能保持那种心态。自矜而又躁进的心态，往往是诗人的自抒其志，有类于“内心独白”。它更多地具有抒情意义，而不具有实践意义。即使实践，也多半是在诗人涉世不深、未谙人生况味的时候。实际生活中，诗人从事干谒的真实心态如何，看看骆宾王的例子就明白了。

被闻一多先生目为“四杰”中的“浮躁”类型，又称之为“博徒革命家”的骆宾王（见《唐诗杂论·四杰》），想象中应该是一位十分飞扬跋扈的人物。但是，当他青年时代初次入京求仕失败，回到寓家的兖州，为干谒地方官而写下那篇《上瑕丘韦明府启》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这般光景：“宾王启：侧闻触笼戢翻，负垂天而局影；伏枥羈蹄，望绝尘而腕足。”一上来就是丧气的样子。继而按照干谒惯例，挖空心思地将对方赞颂一番，然后自陈了因家贫而急于干禄的心情。文末写道：属以蜚秋应节，雁序届时，飘金将露玉共清，柳黛与荷绡渐歇，实含毫振藻之际，离经析理之期。不揆雕朽之材，窃冀迁乔之路。辄期泛爱，轻用自媒。愧荆璞无见致疑，夜光不逢按剑，则沈骸九死，终望衔珠；殒首三泉，徒希结草。载尘清瞩，局影外惭；冒

读威严，循心内骇。”秋天到了，又逢上一年一度的州县向朝廷选拔贡举进士的时节，宾王乞求韦县令予以提携，倘能见顾，则将以生死相报。同期所作《上兖州刺史启》、《上兖州崔长史启》、《上兖州张司马启》等，都表达了类似的内容。这中间当然说了些干谒套话，但诗人心态确实是诚惶诚恐，卑琐寒酸。试想，不干谒就不能入仕，不入仕连养家糊口都成了问题，即宾王在上韦明府启中所说：“糟糠不赡，甘旨之养屡空；簞食无资，朝夕之欢宁展？”在这样的人生实际需求面前，心地再高的人恐怕也得纡尊降贵，委屈以求了。

前述自诩“狂简”的诗人高适，开元二十一年游燕赵时，曾干谒恒州刺史韦济，作《真定即事奉赠韦使君二十八韵》。诗开首曰：“漂泊怀书客，迟回此路隅。问津惊弃置，投刺忽踟蹰。”干谒之际，他的态度竟是那样小心翼翼，战战兢兢。诗中写到自己的境况是：“沦落而谁遇？栖遑有是夫。不才羞臃肿，干禄谢侏儒。”显得十分自卑自谦。写到有求于对方，曰：“方欲呈高义，吹嘘揖大巫。永怀吐肝胆，犹惮阻荣枯。”既想依靠人家，又怕高攀不上。诗末曰：“从来贵缝掖，应是念穷途。”说自己毕竟是个儒生，而今走投无路，乞求对方顾念。要之，所谓“狂简”之态，这时是一点也看不到了。

干谒生涯最苦的，莫过于困居长安十年期间的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里所写的并不是上门“打秋风”，而是干谒。值得注意的是，杜甫此期的某些干谒之作呈现一种内心期许尚高而态度甚为卑恭的矛盾现象。如《赠韦左丞丈济》曰：“不谓矜余力，还来谒大巫。岁寒仍顾遇，日暮且踟蹰。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奉赠太常卿张垠二十韵》曰：“吹嘘人所羨，腾跃事仍睽。碧海真难涉，青云不可梯。顾深惭锻炼，材小辱提携。槛束哀猿叫，枝惊夜鹊栖。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一方面要驰骋腾飞，要涉碧海、凌青云，显得仍有些气概；另一方面，极力渲染眼前苦况，表现出栖栖遑遑的样子乞求对方的悲悯，并预支一番感戴之情。这种心口之间的明显反

差，正表明诗人在干渴之际不得不有意委屈自己，低首下心。其精神承受的痛苦，实不难想见。

就连腰间有“傲骨”的李白，到了晚年陷于困境时，干渴之际也已全无昔日气象。流夜郎遇赦归来后，李白流落江南，曾希冀朝廷对自己重新有所回顾，故有多首干渴之作。在那首有名的长诗《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就发出过直接的恳求：“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在《江夏使君叔席上赠史郎中》诗中曰：“希君生羽翼，一化北溟鱼。”在《赠崔咨议》诗中又曰：“希君一剪拂，犹可骋中衢。”咨议为王府属官，纯为闲散之职，诗人仍要干渴他，几乎有点饥不择食。此期所作《天马歌》，则是一首难以说清干渴对象为谁的陈情之作，诗末写道：“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诗人自比为一匹老马，想返回朝堂，即使充当供天子娱乐的舞马的脚色，也心满意足了。这干渴的目的是何等的教人气馁！

干渴是一种纯功利行为。干渴对象是一定权力的持有者，干渴者处在下风，不能不向权力低头。所以，通常情况下，干渴者总是表现得那样隐忍，那样能够自抑，那样有耐受力。所谓文人的风度气节，暂时都顾不上，平日的性格也遭到了扭曲。为了达到功利目的，人被自觉贬值。这种委屈精神，正是封建时代文人的一种悲剧心态。

但是，他们内心仍处于深刻的矛盾与痛苦中。这是因为，一方面已如上述，干渴时要承受人格、个性的委屈与压抑，另一方面，尽管干渴已成为社会风气，但在人们心目中终非堂皇磊落之事，而带着奔走钻营的性质。建安诗人曹植在他的《求自试表》中就说过：“夫自炫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也；干时求进者，道家之明忌也。”骆宾王在《上吏部侍郎帝京篇序》中也说过：“资丑行以自媒，炫庸音而苟进，固立身之殊路，行己之外篇矣。”然而，功利目的又驱使人们不能不去干渴，这就是他们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所在。为了解脱这种矛盾痛苦，求得心理的苟且平衡，干渴者往往需要自饰。于是，我们

看到这样一种现象：

如前引王勃的《上刘右相书》，尽管写得口气很大，但就在这封上书中，他又说自己“未尝降身摧气，逡巡于列相之门；窃誉干时，匍匐于群公之室。所以慷慨于君侯者，有气存乎心耳。”一边正做着干谒的事，一边却说自己从来不曾干谒，并且把干谒贬斥一番，接着还得再给自己正在进行的干谒寻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似乎这样一来事情才算比较完满，也才觉得心安理得。又如李白，曾宣言自己“不屈己，不干人”（《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又曾在诗中自诩：“青云当自致，何必求知音”（《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但实际上却终生没有停止过干谒活动。天宝元年，他奉诏入京为翰林学士，并且几被任命为正五品的中书舍人。^①对于这次走运，尽管他自己说“亦由于真谷口，名动京师，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为宋中丞自荐表》），似乎完全没有凭借任何外力，但其友人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则说：“与丹丘因持盈法师达。”显然玉真公主的荐举预有力焉。^②盖李白于开元中期初入长安期间，曾寓居玉真公主别馆（见《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又曾作《玉真仙人词》，词末有句：“几时入少室？王母应相逢。”欲谒玉真公主之意甚明。此后的干谒情况虽然难得其详，但李白其人为玉真所知则是肯定的。李白的挚友元丹丘为道士，李白亦好道，正与玉真志趣相投，故有玉真荐举二人入朝之事，魏颢的《序》写在李白身后，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他的话较之李白的自我张扬必定更接近真实。但反过来说，假若李白不那样张扬，又不成其为李白了。

诗人李商隐，十八岁即投靠到令狐楚门下，与令狐楚、令狐绹父子的关系殆非寻常。二十六岁时，在令狐父子荐举下中进士第。但自述开成二年中进士前后的情况，李商隐在《与陶进士书》中有

① 魏颢《李翰林集序》：“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

② 玉真公主，玄宗之妹，字持盈，早年入道，故号法师。

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他说自己入京求举之初，曾想找寻一个“前辈达者”为依靠，但将文章接连贡给数人，遇到的都是一些不通文墨之辈，连他的文章都读不下去，“故自太和七年后，虽当应举，除吉凶及人凭倩作笺启铭表之外，不复作文。文尚不复作，况复能学人行卷耶？”最初虽然有过于干谒活动，但未找到对象，等于没有干谒，也未从流俗而行卷。这是在表白自己的清高。接着说：“时独令狐补阙（绹）最相厚，岁岁为写出旧文纳贡院。”言外之意是：这是令狐绹主动代我做的事，并非我求他这样做。“既得引试，会故人夏口（夏口公高锠）主举人，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令狐绹当时以为高锠是随便发问，便随口而答。直到自己考完三场试下来，他也不曾说过推荐的话，可见自己中第并非令狐绹的有意帮忙。要之，李商隐用这种闪烁其辞，似是而非的语言，是想竭力淡化令狐绹荐举自己这一事实。实际上，还有身居相位的令狐楚的荐举之力，这里压根没有提到，但在其《上令狐相公状》中说得极为明白：“今月二十四日礼部放榜，某微幸成名，不任感庆。某材非秀异，文谢清华，幸忝科名，皆由奖饰。昔马融立学，不闻荐彼门人；孔光当权，讵肯言其弟子？岂若四丈屈于公道，申以私恩！”令狐楚为了荐举自己，连“公道”都置于不顾，可谓照顾到了家。但这情况不为外人所知，也没有必要说给第三者的陶进士听。唯有这封给令狐楚的私人书信，能使我们明白事情的真相。李商隐这番曲意掩饰，也许有难言的苦衷在，但他的文人心思委实太深太细了。

儒家历来视利与义为对立物，君子言义而不言利。但在人生实际需求中，利有时比义更实在，更不可缺少。诗人们为了逐利而干谒，又不敢忘义，所以反过来要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掩饰。已经堕入世俗，还要维持虚假的清高；人格、心灵已经受了委屈，还要装得若无其事。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心态。

四 感激与感愤

干谒请托公行，从根本上动摇了科举本身的公平竞争性质，并使朝廷的人才录用制度整个蒙上了一层阴影。盛唐人王泠然就说过：“仆窃谓今之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唐摭言》卷六）后世，明谢肇淛也说：“唐时举进士，自状头以下，皆以势力游扬得之。以摩诘之才，不难作梨园子弟以干公主。^①及其末也，裴思谦紫衣怀阉竖之刺，求状元及第，而试官不敢违。^②奔竞之风，于斯极矣。武陵之荐杜牧^③，黄裳之访尹枢^④，虽怜才之盛心，而终非公慎之懿矩也。”（《五杂俎》卷一四）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士人被驱上了干谒之路。一种行为，一旦演化为社会风气，就会把绝大多数人，包括有才者与低能者，有德者与无行者全都卷进去。能够不随波逐流而独立特行的人，谅只有极少数。^⑤众多诗人奔竞于干谒之途，到头来无论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人们差不多都经历了一番艰难曲折，品尝过人生的酸甜苦辣。这样，当他们将自己的感受与情怀形诸诗篇时，因遭际的不同，就会有两种迥异的心态：一曰感激，一曰感愤。

感激与干谒的成功相伴随。无论曾经吃过多少苦头，一旦苦尽甘来，干谒有成，就会产生感激之情，一方面是自我庆幸的激动，另一方面是对援引者的感戴。感激的程度，往往与早先所吃的苦成正比。如晚唐诗人李群玉，早年即怀抱“遐想鱼鹏化，开襟九万风”（《登蒲涧寺后二岩三首》）的宏伟志向，参加过科举，但未中，遂广事干谒。尝自述其不得志之状是“愁穷重如山，终日压人头”（《雨夜呈长官》），又形容其渴望入仕的焦急心情是“中夜恨火来，焚烧九回肠”

① 见《集异记》卷二。

②③④ 见《唐摭言》卷九、卷六、卷八。

⑤ 张继可视为一例，其《感怀》诗云：“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终年帝城里，不识五侯门。”《洛阳作》又云：“书成休逐客，赋罢遂为郎。贫贱非吾事，西游思自强。”